

风标才器 实足师范

——忆会计学家李宝震先生

韩传模 执笔



李宝震先生编著的部分学术著作



李宝震先生离我们而去已三十余年。望着先生的照片,我们仿佛又听到了他铿锵有力的声音,追随先生的一幕幕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尤为难忘的是先生那以春风风人、以夏雨雨人的学者风范和师者操行。

先生人格高尚、胸怀坦荡、为人豁达。1937年,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并留校任教,成为该校第一个讲授会计课程的中国教师。1942年,年仅26岁的他被晋升为教授。先生是“会计学”的创始人,是我国“会计学”学派的创建者,他治学遵循理论联系实际,著述颇丰,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出版的论著和教材达150余种,其中教材、专著60余种,论文80余篇,有多部作品获得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1937年,他发表了英文专著《中国之所得税》,得到国际财政专家的重视和赞赏,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院将该书译成法文,日本有学者也引用书中的观点,将其作为参考文献。上世纪50年代,他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与卢世忠合著《工业企业单日记账核算形式》一书,1956年出版后,深受工业企业界欢迎,国内机械、纺织工业系统广泛采用这种核算形式,财政部也在全国推行此核算形式,且流传到了国外。

1980年以后,已步入花甲之年的先生以其深厚的中西学功底,致力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审计理论和价值体系的论文、著作,其独到见解引起会计界的积极回应。1980年,他发表在《会计研究》创刊号上的论文《论社会主义会计的原则》,被公认为国内最早系统提出社会主义会计原则的论文,先生因之被誉为“新中国会计原则第一人”。他所著的“三论”(论会计的性质、作用、原则),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并被多数会计教科书所引用,日本学者也赞扬他是“中国会计改革的前驱”。

先生治学严谨,师风坦荡。在一次兄弟院校举行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他谈道:“对于提交答辩论文的内容,我个人并不了解,来此特地请教了一位专家朋友,下面我就将这位专家的意见宣读一下,供论文作者参考。”这番真诚的“表白”令人印象深刻。先生的一篇文章《案例教学有助于造就智能型审计人才》,刊登在《审计研究》1986年第1期上,在文章的最后,先生特意注明:“本文参考美国 Alan·P·Johnson(艾伦·P·约翰逊)于1980年出版《Auditing Judgment》(《审计判断》)一书的序言改写而成”,其治学的严谨态度和对他人的尊重可见一斑。

先生的学生刘铁良博士曾深情地回忆:“先生安排我给国际会计新专业的学生讲英文原版教材的会计原理,从我开课的第一天起他连续听了十几节课。当时先生已经70多岁,担任会计系名誉主任和众多社会职务,教学、行政工作非常繁忙,但每次上课他都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仔细听我讲每句话、每个发音,并做好标记。课间休息时经常把我叫到教室外面,告诉我什么地方没讲透,哪个单词发音不准,下一节课我立即补讲或纠正。每当看到先生坐在后排,我就信心满满。”先生对年轻教师和后学的关心、指

导,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先生一生投身于会计教育事业,为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1949年天津大学成立,先生被人民政府任命为副校长。他虽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仍然坚持上教学第一线,讲授会计、审计课程,不脱离教学岗位。1974年为天津郊区培训会计人员时,先生与学员一起住在渺无人烟的山区废墟旧址,吃窝头和发霉的咸菜,喝矿井脏水。他独自一人既教会计课,又讲政治课;不但授课,还辅导习题;从早到晚不离学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后,他体重减轻了20多斤。结业时,有学员拉着先生的手声泪俱下,舍不得让他回市区。

“文革”结束后,感受到科学的春天来临的先生,倍觉大好时光的珍贵和教育事业的重要,致力于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他做了一系列工作,进一步改进教学,促进我国会计教育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国门打开,跨国公司纷纷涌入,外资企业如雨春笋般涌现。先生超前意识到,必须尽快在高等院校财经院系设置国际会计专业方向。为此,他利用发表文章、学术发言等各种机会反复宣讲他的观点,呼吁有关部门加以重视。1986年,在国家教委召开的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会议上,由先生负责起草的国际会计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得到国家教委批准。之后,在先生的努力下,天津财经大学在全国财经院校中率先开设国际会计专业和审计专业。也是在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先生担任会计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他生前招收了近10名博士。这一年,学校还举行了李宝震教授从教50周年庆祝大会。先生是天津财大会计学科创始人,纵观天津财大会计学科发展所走过的每一步征程,无不浸透了先生的心血。

先生对我国会计教育事业倾注了深切情怀。能成为先生的弟子,是我们此生最大的荣幸。先生的朴实无华、言传身教影响着每一个人。师恩难忘,永铭于心。

(本文内容系李宝震先生的学生于长春、石爱中、刘铁良、陈敏、郝振平、张立民、韩传模、蔡春共同回忆,执笔者系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学人小传

李宝震(1916—1993),江苏昆山人。1937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自1942年起历任天津工商学院教授、会计财政系主任,津沽大学副校长,南开大学教授,天津财经大学会计系教授、首任名誉系主任以及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会计学会理事长等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天津会计学会名誉理事长、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顾问以及天津市高等院校教师晋升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天津市高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机械工业会计学会、兵器工业会计学会、铁道财务会计学会、建筑会计学会顾问,天津市政协委员。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光荣称号。编著有《中国之所得税》《中国会计简史》《国际会计》《国际审计》等。



沽上 丛话

近代以来天津成为中国工业文明的前驱城市,拥有众多弥足珍贵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是天津历史文化的象征,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其中一些还承载着天津珍贵的红色记忆,深具厚重的时代价值。“近代中国看天津”,文物建筑见证了这座城市不平凡的过往,许多仁人志士在这里留下红色印记。2021年11月,《天津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正式公布实施,《条例》将重要历史事件和活动的旧址、遗址或者场所以及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和其他纪念设施纳入红色资源进行保护传承,旨在充分发挥红色资源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天津是全国最早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的城市,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此发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此活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让革命的萌芽在中华大地破土而出。

位于今河北区宙纬路三城里49号的天津觉悟社纪念馆,是依托觉悟社旧址而建的,这也是当时觉悟社唯一一个固定下来的活动地点。1919年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天津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5月7日,天津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五七”集会游行;9日,部分北京学生代表来到天津,进行报告宣讲活动,进一步扩大五四爱国运动的声势。在不断高涨的爱国热潮中,青年学生进一步觉醒,由南开大学、高等工业学校等学校学生组成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由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为主组成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多次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新思潮和社会时事,号召民众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还发动了一系列抵制日货活动。此时,刚从日本回到天津不久的周恩来同志以最快的速度参与到了这场爱国运动中。6月下旬,周恩来作为主编,和进步学生骨干筹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下简称《会报》),7月21日正式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题为《革新!革新!》的发刊词,提出改造社会和自觉改造思想等主张。8月,山东发生“马良惨案”事件,周恩来在《会报》发文疾呼:“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当得知刘清扬等天津各界代表与其他各地赴总统府请愿代表被捕的消息后,周恩来当即组织《会报》刊出号外,揭露反动政府阴谋罪行,并决定组织更大规模的请愿斗争,营救被捕代表。经过这一系列事件,天津进步青年学生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更严密的团体。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在天津东南角草场庵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主持人并起草宣言,会议决定团体本以“革新”“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觉”为主旨,要求社员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在《觉悟》上发表一切主张。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北京《晨报》赞扬道:“天津只有一个这样的团体,可以说是天津的小明星……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他们抱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

天津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组织也创建较早,且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领导机关、重大事件和会议地址、杰出革命家和进步人士住址等几百处革命历史建筑都记载了发生在天津的红色故事。

和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坐落着一栋砖木结构的小楼,这里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1936年,为了贯彻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派刘少奇同志主持北方局工作,到天津领导华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刘少奇抵津后,先是以茶商身份住在日租界的北洋饭店,后来搬到法租界的一家旅馆。为了更加便利地开展工作,在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林枫帮助下,刘少奇搬到了法租界隆泰里一家成衣铺的二楼居住,并将其作为北方局的办公地点。这里地处海河沿岸附近,道路交错纵横,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小楼有三个出口,也便于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撤离,刘少奇在这里完成了一系列党的秘密任务。同年5月,日军以“防共”名义向华北地区增兵,并强征大批民工修筑工事,竣工后又成批将民工杀害,弃尸海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河浮尸案”,引发全国人民震怒。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发动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在5月28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写给刘少奇的信中提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刘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天津众多的红色历史建筑,赓续着津沽大地的红色血脉,传承着历经百余年的革命薪火,也见证了天津人民那段光荣的历史岁月;用活红色建筑,讲好天津故事,才能把红色文化基因传承好,使广大人民群众加深对城市历史底蕴的理解认同,为建设彰显天津特色的津派文化提供强大动力。

满庭芳

第五二三期

因不愿“随俗浮沉,同流合污”服毒自尽。陈白露在一年后便推出了以艾霞个人经历为素材的左翼影片《新女性》,然而正因此片引发轰动之时,其主演阮玲玉却因“人言可畏”而服毒殒命……红颜薄命的悲剧和围绕于她们身边醉生梦死、蝇营狗苟的众生相,让曹禺恨透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于是,《日出》应运而生,以抗战前的天津为背景,以善良与虚荣并存、集光明与黑暗于一身的“交际花”陈白露为中心,勾勒了形形色色人的平庸、堕落、痛苦与挣扎。

复排导演张艳秋正是天津人艺经典版《日出》女主人公陈白露的扮演者。陈白露曾受过新思潮的洗礼,当她变成了交际花陈白露的时候,她内心是复杂的,甚至是异常痛苦的。她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看似快乐而自主,实则她才是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人——她的命运早已被无形的枷锁捆绑在那旅馆中,她越想逃离便越陷越深。

在这版复排的《日出》中,女性角色群像更加出彩。除了陈白露,传统女性李石清太太、底层女性翠喜和小东西等人在用不同形式试图反抗命运的枷锁,但命运的正手却活生生地将她们压入无边的黑暗中。这一版对翠喜的刻画更加细致,这也呼应了曹禺先生对翠喜的无比珍视,认为她是在一堆“人类的渣滓”里仍有一颗“金子似的心”,翠喜虽然生活在地狱里,也沾染了地狱中的各种坏习惯,但她对那些比自己更加悲惨无告的人怀有最强烈的善意和同情之心。翠喜的善良更凸显了她悲惨的命运并非甘愿所致,而是社会的不公与压迫使然。然而,即便日出就要来了,而习惯了黑暗的她们却注定要被埋葬在日出之前的黑暗中……

在演出的最后,当陈白露缓缓倒在黑暗中时,远处响起来自码头工人们高亢的“夯歌”——这正是曹禺对未来“日出”的理解和向往,一个用劳动换取尊严的新世界。1936年,曹禺与郑秀的订婚仪式上,田汉送来亲笔祝词,写道:“譬如《雷雨》,登山看《日出》!”道出了彼时所有人寄托于《日出》之上的向往新世界的决心。

《乞力马扎罗的雪》:海明威的半自传影像

曹宇田



个人的半自传体小说,这个曾经如雄鹰般的男人,此时虽仅33岁,却一改之前的昂扬姿态,袒露自己迷茫脆弱的一面。战争让他的心迅速沧桑,对于生活的激情也在减退。

1952年,《乞力马扎罗的雪》被搬上银幕。很多人认为,这是海明威最难改编的作品,因为它是一部意识流的小说,具有时空交错、现实与梦境交织的特点。挑战之下,制片方给出了极高的诚意,不仅根据海明威自身经历细化了故事,比如他的四段婚姻、在战场上的细节场景等,选角方面还请到著名男演员格里高利·派克出演男主角。影片也获得了大众认可,收获了第25届奥斯卡金像奖两个奖项。

《乞力马扎罗的雪》出版后,海明威的身体一直饱受疾病的折磨,患上皮肤病、肝硬化,在晚年还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因为身体的原因,他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却一直没有向生活低头,53岁时仍能拍在《老人与海》中写下:一个人可以被摧毁,但是绝不能被打败。

9月7日22:22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乞力马扎罗的雪》,9月8日15:56“佳片有约”周日影院版精彩继续。

《日出》复排 突出女性群像

杨一丹



2024年8月28日至29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复排了曹禺先生的经典话剧《日出》,由梅花奖获得者张艳秋担任复排导演。

《日出》写于1936年,是继《雷雨》之后曹禺的第二部重要剧作。那时曹禺已经完成了清华大学的学业,于1934年回到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风起云涌的抗日背景之下,“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正是刺激曹禺写《日出》的根本原因。曹禺曾说《日出》一剧的创作,灵感和蓝本完全在天津,“地点也可以说基本是在天津惠中饭店,另外是南市‘三不管’一带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妓院。翠喜、小东西是确有其人的。”

掌门人说老字号

芦台春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康熙元年(1662),芦台人张德和在“千年雄镇古芦台”的北街蓟运河畔始创德和酒坊,用烧锅酿造德和老酒。凭借其独特的酿造技艺和卓越的酒质,德和酒坊在当地乃至更广泛的地区赢得了声誉,为芦台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芦台,德和酒坊被迫与日本人开的“朝日酱油公司”合并,生产场地及经营利润均被日本人霸占。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芦台春迎来了重获新生的时刻。张子琴先生(上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德和酒坊的经营者)的坚持让这份传承得以延续,为芦台春的复兴注入了新活力。新中国成立后,酒厂转为公有制,更名为芦台酒厂,在厂长王斌的带领下,恢复了白酒酿造,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

1964年,中国白酒泰斗周恒刚先生怀揣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率国内酿造业的专家、技术人员进行了以科学总结茅台酒生产工艺为中心的茅台试点工作。1972年,周恒刚先生应芦台酒厂厂长潘兴云之邀来厂考察指导,并将从茅台窖底分离出的菌种带到芦台,创研出我国北方第一瓶优质酱香白酒,命名“芦台春酒”。芦台春酒一经上市立刻轰动中国酒界,被誉为“北方茅台”,打破了中国北方不产好酱酒的刻板定义,实现了周恒刚先生在北方生产优质酱酒的目标。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芦台春人不仅迅速重建了厂房,更在周恒刚先生的带领下,以宁河县酒厂为基地,实施中国酒界的“芦台试点”,完成了“泸型白酒窖泥微生物选育与防止老化”和“酱香型白酒香味成分研究”两大科研课题,分获国家级、省级科技进步二、三等奖。这一时期芦台春的努力,推动了中国白酒高品质发展的进程,也为自身的技术创新和品质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从1996年开始,芦台春经历了合资、分置、资产重组等一系列变革。2003年,芦台春加盟天津泰达集团,更名为天津泰达酒业有限公司,为品牌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2008年,芦台春进行了“混改”融资,推动设施改造和管理机制的改革,加强品牌建设。2011年,芦台春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2年,酱香型芦台春系列白酒

获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同年,芦台春检测中心获国家级实验室认证;2013年,芦台春传统酿造技艺列入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编入地方志及史料、教材。

传承古法的芦台春主动拥抱现代科技。2010年,芦台春投资近千万元建立了国家级白酒实验室,成为国内第六家拥有国家级白酒实验室资质的白酒企业。2021年,芦台春深化校企合作,与天津科技大学合作,以解析“北酱舒适酒特征风味形成机理及指纹图谱构建”为课题,对“北酱”特质展开科学研究,成果显著。科研人员对大曲生产和白酒发酵两个关键环节进行了跟踪,分离了大量的微生物,得到了两株高产优质的酵母菌,有效提升了白酒品质,果香和甜香也更加突出。在科技加持下,芦台春的高端酱酒、果味白酒、私人定制藏酒等一系列创新产品应运而生。

饱含岁月沉淀的芦台春,懂得“守”的定力与“变”的智慧。芦台春实施“多品牌塑造,多品牌运作”的品牌战略,以芦台春为品牌基础,构建起“北酱”与“葡”两个高端延伸品牌。线下通过多种方式增加品牌曝光度,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类酒类展会和活动,展示品牌形象与产品特色,提升知名度;线上利用新型社交媒体及电商进一步扩大品牌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促进产品销售。

在文化建设上,重点打造芦台春文化博览园。2023年,芦台春文化创意产业园景区被认定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通过酒文化博物馆、传统酿酒公益传承体验基地等开展地域历史文化感知、酒文化游览体验、多门类艺术交流等活动,展示宁河独特的地域文化,探索文旅融合的新路径。通过与天津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国际校友会的校企合作,不断进行科技赋能和传统文化的向外传播;开展跨行业合作,与全球最大的车辆租赁公司赫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扩大社会影响力,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公众认可度。

2024年,芦台春荣获“中华老字号”称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激励,我们将继续秉承“酱一瓶好酒的信心”,坚持传承古法酿酒技艺,同时不断探索科技赋能创新之路。一方面,芦台春将以弘扬天津历史文化为己任,以重塑天津白酒形象为目标,努力打造代表天津白酒品牌,朝着中国酱酒前10、北方酱酒第一的目标,脚踏实地地前行。(作者系天津芦台春酿酒有限公司总经理)

芦台佳酿的传承与焕新

李继齐